

# 近代日本文化中的中國品味

● 筒井清忠

二十一世紀的日中關係應是怎樣的呢？考慮這個問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重新回顧近代的日中關係。不可否認，這期間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中全面戰爭，但這不是近代百年日中關係歷史的全部。在這段歷史中，還包含了多樣且複雜的因素。

本文試圖將視點放在近代中國文化如何影響日本的問題上，這一側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尤其是中國文化對近代日本的上層文化發生的重大影響，至今仍未得到研究。

近代日本文化積極吸收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中國文化的影響仍不容忽視。下文將以舊熊本藩主細川護立、護貞父子為典型事例，探索中國文化在近代日本的軌迹。

## 護立、護貞父子的中國教養

首先介紹一下白洲正子所描述的昭和時代前期細川護立的生活狀況。細川護立係末代熊本藩主細川護久之子，生於1886年，歿於1970年，是前

首相細川護熙的祖父。護立的宅邸建於東京小石川的高臺之上，被稱為「宮殿」。庭院內的池塘映着柳樹的倒影，各種珍禽棲息其間，這些柳樹是從中國移栽的。細川家至少有三間書房。一間是英國式的，藏有從藏書家手中買下的全套西文文庫，而書桌上放着歌德著作的初版版本，還有很多尚未讀過的書籍，充溢着歐洲的氣息。而在中式書房裏則是另一番景象，那裏擺放着中式家具和文房四寶，主要是向來客展示唐、明、清代的陶器。至於日常使用的日式書房，客廳正面懸掛着安井曾太郎的傑作《喇嘛廟》，當白洲正子對這幅畫表示欣賞時，主人告之「那是複製品，我這裏多的是」。這使白洲頗為詫異。

細川家在輕井澤的別墅裏懸掛着琳琅滿目的油畫，護立解釋那是「客人來訪時畫了留下的，時間一久就積了這麼多」。其中一幅引人注目的風景畫，白洲問：「這也是嗎？」護立不經意地回答：「是塞尚的作品。」對於美術愛好者請求參觀他的收藏，護立總是爽快地予以滿足，但對於前來走馬觀花的人，則一概回絕，如洛克菲勒。

白洲曾有一次討得細川家的刀劍名工匠又七的作品，每日觀看，覺得有些蹊蹺，便懷疑是複製品。過了幾日，上門找到護立問：「這大約不是又七第一代的作品，請給我真品。」護立說：「啊，真被識破了，沒辦法。」他實際上是為了測試正子的藝術鑒賞品味。

護立的收藏從安井曾太郎、梅原龍三郎、塞尚等人的油畫，到白隱、仙涯、富岡鐵齋的日本畫，還有刀劍、小件飾物、用品、刀劍護手、唐三彩，範圍十分廣泛，據說多是在這些藝術品尚未受到定評時收集的。護立讀書題材遍及古今東西，擅長高爾夫球和網球，談話機敏，話題從政治、經濟、藝術到體育無所不包。

現在，護立蒐集的書籍和美術品分別寄贈、保存於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和永青文庫，這些資產的大部分都來自他的實業。對於多才多藝的細川護立來說，最重要的文化收藏是在中式書房內。

護立心中的理想人物是中國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全國蒐集文物，將珍本、孤本集為《四庫全書》，因而護立捐贈給斯道文庫的書籍，以漢學家古城貞吉蒐集的漢學典籍以及法國人科爾迪的亞洲研究書籍為主。

幼年時代，護立曾問漢文老師：「我也能寫出杜甫或者李白那樣的詩嗎？」老師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嚮往成為漢文學家的護立才斷念，但他仍熟讀《唐詩選》，而又對清朝美術情有獨鍾。最能證明護立景仰中國教養的例子便是：由於中國學權威狩野直喜在京都大學執教，他就建議兒子護貞到京大求學。護貞曾說：「父親對我說，狩野先生在京大，你應該到京大去。」他這才赴京都求學。護貞說：

「從那以後，便一直師從狩野先生。」

護立的中國情結在護貞身上結出了果實，以下想探討一下護貞的生活軌迹。護貞生於1912年，畢業於學習院高中和京都大學法學院。他曾擔任近衛文麿首相的秘書，戰後從政界引退，歷任永青文庫理事長等職。

我們來回顧一下護貞跟隨狩野學習時的情況，從中領略昭和年代初期京都中國學的學風。當時的教材是《影宋本尚書正義》。護貞問狩野預習時該用甚麼樣的字典，狩野回答說：「漢代許慎著的《說文》最好。還有清代段玉裁為《說文》一字一句加註的版本。」護貞到寺町大街的書店買到了篆書的《說文》，雖有段玉裁加的註，但卻是沒有標點的中國文言，根本看不懂。護貞去向狩野詢問，狩野笑道：「古代中國人就講這種語言，讀書百遍其意自明。」「幾遍幾百遍地閱讀，自會漸漸領悟。」護貞心想「苦也」，只好每天閱讀，結果，「雖不到百遍，但慢慢懂了意思。到底是表意文字」。他以弄懂的部分為線索，查閱日本的字典，找到狩野問：「老師，是不是這個意思？」狩野又笑了：「你查的是漢和字典吧？」「是。」「那都是不懂文字的人寫的。」如此這般，護貞每天堅持「讀書百遍其意自明」的信念，以後學習《尚書》時，護貞又去參考《國譯漢文大成》中由大學者宇野哲人所譯的《尚書》，對照原文來理解，當向狩野彙報時，「先生莞爾一笑，說：『你讀的是《國譯漢文大成》吧？那本書不值得參考，那是不懂文字的人寫的』」。

「真煩。狩野先生說人家不懂文字，其實都是相當有名氣的學者的作品。但是，狩野先生的治學是將一個文字由表及裏，直到其表達的含意都深刻領會。狩野先生看到一個文字，

便可以聯想到很多其他用法，例如在哪個時候、哪個場合用過，在某個場合表達這個意思，而另一個場合則是其他的意思。同樣是翻譯一篇文章，狩野先生的譯文之精確，顯然令其他版本黯然失色。他精通中國自古到今的經典，題材從小說到史書。像這樣的人物實屬罕見。」

這樣，護貞的中國教養逐漸形成。他學習虎關師鍊故事，故事中講來自中國的僧人跟日本僧人交流時，中國僧人答問題侃侃而談，日本僧人卻答不出中國僧人的問題，於是發奮學習，寫出日本高僧傳《元亨釋書》，護貞仿效其做法，重讀日本的經典。讀過漢文後，日本經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也就顯得易於理解了。

### 護貞理想中的「文人品味」

護貞曾擔任日本插花藝術協會的會長，由於他的漢學修養，致令他的插花藝術起源論也顯得很獨特。從池坊流派的《仙傳抄》等書中難以確切得知插花藝術的起源，僅說「立花」、「立華」是插花發源的開端，護貞認為插花藝術的起源之一是在寺廟中為佛祖供花的人漸漸專業化，由佛前供花發展到插花。另外，他從室町時代《君代觀左右帳記》記載的客廳裝飾方法，推測這也是插花的源流之一。裝飾客廳的一位專家是愛好中國藝術的僧人阿彌，他在裝飾時所使用的全是中國藝術品。

從中國藝術品跟僧人的關係着手研究，護貞又從史料中得知，日本人俊芳及其弟子雲照在宋代到了中國，將「剪花法」帶回日本。他認為這可能是日本插花的起源。池坊也有在佛像

前供花的做法，但那是供在佛像下方，從花、佛像的下方向上仰望，護貞指出從上向下觀賞插花的方向變化，是日本僧人從中國宋朝帶回的文人品味，即將花裝飾於案頭或接待客人的廳堂一角，以欣賞花卉為中心。

護貞這樣解釋文人品味：「文人這一語彙始於周朝，文人品味則在宋代變得發達，這是一種享受生活的品味，對所有事物充滿探究心，對眼前事物具備觀賞心理。陶器、書法、詩歌、園林直到仙鶴、貓狗，都包括其中。對於觀賞物還有規則和標準，傳入日本後對插花和能樂的程式也發生影響。文人所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原先意為寫文章的人，本質上有別於現在的『文化人』。區別在於盡採雅趣和野趣之長，並將二者巧妙結合，形成清新風格的品味。能理解這種品味的才是文人。雅趣來自人工，過份追求便成堆砌；野趣中自然要素較多，過度便成鄙俗。既非堆砌又非鄙俗的清新高潔正是文人的追求。」

護貞闡述這種生活方式和品格時說：「舉世追求仕途的眾生裏，有不肯聞達於諸侯，而堅持自身追求者，是因為要盡其天職必須擁有個人空間。儒家的信奉者肯定隱逸生活的根據在於《周易》，隱者在受到世人尊敬的同時過着高潔的生活。」

根據狩野的弟子武內義雄所著的《易與中庸的研究》，貫穿《易》的是中庸的思想，中庸強調「中」——不偏不倚，避免極端的左或右。「不動喜怒哀樂之情，此乃中也。」喜時得意忘形，怒時頓失常態，在這一切尚未發生時的狀態稱為「中」，也可謂之「平常心」。占卜時出吉籤要格外謹慎以免招來厄運，出凶籤則要想到這已是最壞的可能，以後會時來運轉，勉勵自己努

力。不動喜怒哀樂之情冷靜思考，便能恰當地分析事物，這才是文人的理想境地。

在實際的弟子教育中，文人品味又是如何體現的呢？護貞認為，狩野直喜是尊崇中庸的文人典型。狩野常指導弟子「多讀經典」，他在20年代後期說：「歐洲有教養的人都會讀經典，就是希臘、羅馬和基督教以及其他名著，從孩童時代每天閱讀，因此在緊要時刻很少犯錯誤。但今天的日本人並非如此，因此很危險。」護貞受此影響，也為弟子講解《論語》和《古今和歌集》。

### 回歸中國品味和古典

從細川父子的文化生活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近代日本雅文化中文人品味、中國品味的問題。可是，追溯從夏目漱石的漢詩、山口昌男《敗者的精神史》中部分篇幅研究成島柳北到永井荷風直到河上肇等人的軌迹，至今尚無從近代日本教養整體（包括雅文化在內）出發，正面論述文人、中國品味的研究。

可是，為甚麼長期生活在巴黎的護立會對中國品味發生興趣？這一心路歷程與日本代表性的教養主義者和赴哲郎的古寺朝聖有相似之處。換言之，近代日本主修西學的菁英愈是深刻理解西方文化，愈是深受其中蘊藏的希臘羅馬經典的吸引。他們不得不深切意識到，學習西學、景仰西學即使有所成就，作為日本人憧憬西方古典的意義究竟在哪裏？最終日本人還是要想起自己的希臘羅馬——京都奈良，回歸日本的古典。

這樣，他們領會到對日本古典文

化產生巨大影響的中國文化的魅力。直至明治，為日本文化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們，他們精神深處一直受到中國文化的強烈刺激。佛教美術、清少納言、五山文學，還有現在被認為是日本傳統文化核心的室町期起源的各種文化都如此。唐木順三在《文人氣質》中曾論及江戶時期文人競相取三字姓名的「唐人崇拜」，亦是一例。日本文化傳統與其中的中國品味已不可分割，因此回歸日本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歸中國。由此可見，有必要重新探討近代日本中流階級以上文化中的中國觀。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清朝遺臣王國維曾到日本跟內藤湖南等京都學派學者有過高水準的交流，後來多次寫入這些學者的回憶錄。直到昭和年間，以住友財閥的核心人物小倉正恆為代表的眾多財界人物仍對漢籍和中國文化充滿景仰。到昭和後期，政財界人物中奇妙地興起崇拜漢學者安岡正篤的熱潮，這和上述現象的起因也有相似之處。

至此，筆者以中國文化對近代日本的影響進行探討，從中可以感受到中國對近代日本文化深層構造的深遠影響。如果加深這一領域的研究，肯定會給日中關係的研究提供嶄新的視點，並對中國和日本建立新型關係作出重大貢獻。雙方與其僅僅將眼光放在易受各種因素影響的政治友好或敵對關係上，不如更多意識到日中在文化上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我認為這是日中考量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雙邊關係時最應具備的眼光。

夏冰 譯

筒井清忠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